

总主编 于友先

河南 新文学 大系

(1917-1990)

短篇小说卷 (一)

主 编 曹增渝

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说明

《河南新文学大系》(1917—1990)是全面反映和集中展示河南新文学七十余年发展历程与创作、研究成果的系列丛书。全书按文体和内容性质分为理论批评、短篇小说(一、二)、中篇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儿童文学、通俗文学、史料等9卷10册。

本丛书所收作品,都是从河南籍和长期在河南生活创作的外省籍作家自1917年至1990年公开发表(出版)的新文学作品遴选出来的。入选标准,力求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兼顾题材、风格、流派、社团的广泛代表性。由于其中有些作品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下创作的,难免有这样那样的局限性,相信读者自能鉴别。

入选作品或其他资料,尽量以初次发表的版本为准;最初版本实在找不到的,则以最接近原貌的后出版本为据。在编辑加工过程中,除订正明显的文字、标点讹错外,对原作一般不作改动。在现代白话文发展成熟过程中曾经出现过的与现行语言文字规范不尽一致之处,如“的”、“底”、“地”、“得”的分合,“他”、“她”、“伊”、“妳”的用法,以及一些译名、方言、数字、计量单位、特殊的人名用字等,亦一仍其旧。

各卷所收作家、作品,均按时间先后顺序编排。作品一般以

初次发表(出版)时间为准;初次发表(出版)时间难以确定者,以写作时间为准。作家则以该卷所收其发表(或写作)最早的作品的时间为准。理论批评、儿童文学、通俗文学、史料等卷,因所含文体不一,情况比较复杂,故又酌情分为若干部分(单元),每部分(单元)中作家、作品的顺序,亦参照上述原则编排。

在河南新文学发生发展和逐步走向成熟的七十余年间,中原地区屡遭兵燹和“左”的政治运动的干扰,有关史料损失严重,给本丛书的编选工作带来不少困难。再加上编者水平和选本容量有限,时间仓促,遗珠之憾,实所难免,诚望有关专家、作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七十余年来,先后移居在港澳台地区及国外的河南籍作家自然也应在本丛书编选范围之内,但由于征集资料等困难,本丛书未能收入他们的作品。这一缺憾,有待将来增订再版时加以弥补。

本丛书的编纂出版,得到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河南省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暨办公室、河南省新闻出版局、河南大学、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河南省文联、河南省图书馆、河南大学图书馆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得到广大河南作家及其亲属、师友的热情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河南新文学大系》编纂委员会

河 南 大 学 出 版 社

1996年10月

总 序

张 光

编纂《河南新文学大系》，作为一项大型的文化工程，开始于“八五”期间，经过许多同志的共同努力，历经五个寒暑，就要付梓了。

编纂委员会曾经指出这项工作缘起于这样的考虑：河南省的新文学，是我国新文学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艰难曲折中发展壮大，取得了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成就，是河南乃至全国现代社会生活的生动见证，是现代河南人民精神风貌、文化性格、生命状态和风俗习惯的艺术记录和真实反映。它从一个新的时代高度，丰富和发展了我省的本土文化传统，推动了社会生活的变革和进步。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战争、灾荒和动乱的影响，我省新文学有关史料散佚严重，系统的收集、整理、研究、总结工作迄未进行；加之，河南文坛的一批老作家年事日高，史料的挖掘更是刻不容缓。

为此，当本世纪的最后十年到来的时候，编纂《河南新文学

大系》，以对河南新文学的发展进行一番认真的总结，从而对辛勤开拓的前辈有所交代，对正在奋进的今人有所启示，也给翘首期盼的后人留下一份完整的遗产；同时，这也是进行省情和国情调查研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是制定当前和今后的社会文化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参照。

二

1917年开始的中国新文学，地处中国中部的河南不是中心，甚至应当说离中心相当远。在新文学的前三个十年里，也即新中国开国前的三十多年时间里，在河南，由于贫穷、战乱、自然灾害所带来的传统农业文明的衰颓、民生的凋敝，现代工业的缓慢发展所带来的现代文化的薄弱、现代文明的迟到，影响到河南整个文化的发展，当然也影响到文学的繁荣。

在那个不算太短的历史过程里，河南向全国文坛奉献了自己的文学英才。南阳，有冯氏兄妹（冯友兰、冯沅君）和稍后的姚雪垠、任访秋、张长弓、李季；豫西有曹靖华；豫中有徐玉诺、于赓虞和稍后的刘心皇、魏巍；信阳有尚钺、赵清阁；豫东有师陀、苏金伞；豫北则有丰村、尹雪曼和稍后的刘知侠，等等。

这些人分别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以至文学理论领域，放射出引人注目的甚至璀璨的光芒，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光彩。这是我们河南的光荣和骄傲。

但是仔细检讨起来，又可以发现这样两个不成规律的规律性现象：

一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广袤的地域、深厚的文化积累和数量巨大的人才积存的大省来说，这些人才还是太少了。他们分布在我们这个中州的天宇上，不能说是满天星斗，只能说是寥

若晨星。广袤的田野里长出的是茁壮的大树，可惜，是稀少了些。

二是他们大多是在走出本土以后，方才做出了文学实绩。他们的作品反映了家乡的生活、社会和人物，带着无法抹去也无法淡化的河南特色。但是，客观的历史情况是，故乡却没有为他们提供成长和发展的优厚条件。因而，在本土和在全国文坛，都没有也不大可能形成一个带有地域特征的文学流派，更不要说文学“豫军”了。

三

新中国建国以后的文艺春天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河南的文学队伍得到了组织。从外地归来的，从外省来豫的，本土产生的，形成了一个有生命活力的创作队伍。

特别应当提出的是李準和魏巍。前者以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一鸣惊人，然后有大量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电影剧本问世，以敏锐的政治触角、鲜活的人物形象、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娴熟动人的中原话语，及时地反映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乡村生活，塑造积极投入和创造新的生产关系的新的农民形象，表现还不情愿地接受改造的各种农民的心理和行为；后者以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报道和表现了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人民军队的感人事迹。文章一发表，“最可爱的人”的称号像一个命名，不胫而走，在全国广为传颂。魏巍的作品，像李準一样，由于和当时的社会心理、社会运动相应和，受到党和政府的赞赏，引起文坛的高度重视和极高评价。他们在青年时期即成为全国文坛有重要影响的代表性作家。

但不幸的是，由于政治运动的错误打击和文艺政策、创作思想的日益“左”倾与狭隘，致使刚刚组织起来的队伍受到很大破

坏,创作的多样化和作家的个性没有得到健康和谐的发展。在50年代以至60年代前期,尽管有李準和魏巍等几位有相当影响的新锐,但是,仍然立不起来河南作家的群体形象。

至于此后接着的十年动乱,更是对文学的浩劫,文学队伍受到空前严重的摧残,文学创作活动几近停止。

只是到了历史新时期,文学“豫军”才真正形成并健康地发展起来。特别是80年代和90年代以来,各种文学样式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几代作家共同展示着新的辉煌。

先是老一代作家老当益壮。他们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早期奉献出一批创作成果,堪称中国文坛的扛鼎之作。

以长篇小说而论,姚雪垠的历史小说巨著《李自成》,李準的《黄河东流去》,魏巍的《东方》以及《地球的红飘带》等,以其深厚的生活功底、娴熟的艺术功力和对历史与人生的思想穿透力,显示了中国作家的当代水平。它们都获得了作为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虽然姚雪垠和魏巍已经离开了河南,但有三位河南籍作家获奖,仍然不能不让河南感到光彩。

在河南本土,一批在历史上受到错误打击得到改正后“复出”的老作家,厚积薄发,重新焕发创作青春。特别是诗人苏金伞,不仅他在晚年创造了个人的诗歌高峰,而且以其冶炼乡土和现代于一炉的成熟思想和纯净的诗风,为中州诗坛树一大纛,引起全国诗坛注目。

在戏剧文学创作中,以杨兰春为代表的剧作家也是一个不小的群体;以李準为代表的电影文学创作虽然人数不多,但在全国影响颇大。

这些老作家,像军队的将帅一样,启悟着、引导着文学的后来者。

然后有张一弓异军突起。他在“不惑之年”以后重操中断了

二十余年的文学“旧业”，一鸣惊人，以中篇小说的形式连续不断地向文坛发起“冲击”，以其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和直面历史的勇气，率先冲破一些题材禁区；以其强大的思想道德力度，唱起苍凉悲壮的英雄之歌；其主观抒情性极强的有些“洋派”的叙述语言和具有浓郁乡土气息和性格特征的人物对话相融相契，形成别具一格的语言特色。他以《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赵轱头的遗嘱》、《春妞和她的小嘎斯》连续获得全国中篇小说奖。张一弓为河南文学界争得了荣誉，就其在全国文坛的影响而言，张一弓成为公认的如50—60年代的李準一样的河南作家的又一代表。更重要的是，他使大家树立了信心，看到了河南文学队伍的实力和潜力。

与此同时，与张一弓年龄不相上下的一批50年代的青年作家，如南丁、乔典运、段荃法、张有德、徐慎、张斌、郑克西等的小说，王绶青、王怀让等的诗歌，都不断有佳作问世，引起全国文坛的注意。

四

也几乎在张一弓前后，河南文坛出现了一个多年不遇的现象：一批中青年作家在乡村和省城崛起。这些人于80年代在文坛会合起来，数量之多、之集中，过去是未曾有的。他们应和着时代的潮流，出现了空前良好的创作态势。

他们大约来自两个不同的方向：一是从乡村底层走向城市（工厂、机关、军队、学校），如小说家叶文玲、张宇、田中禾、郑彦英、周大新、阎连科、刘震云、张兴元、侯钰鑫、孙方友，以及专治散文的周同宾等；一是从城市走向乡村底层（或部队基层）又回到城市，如小说家杨东明、齐岸青、李佩甫、王钢，以及专以历史

题材为对象实际是创作社会小说的二月河,等等。

这里说到的一些作家,基本上是小说家,只有周同宾是个例外。但新时期的河南文坛,却不是只有周氏一人从事散文创作。从各个文艺行当伸过一只脚来踏进散文创作领域的作家不止十个八个。阎豫昌、孙荪、余非、卞卡、范强、周熠、廖华歌、曲令敏、邓万鹏,以及不少小说家、批评家、诗人、新闻工作者们,他们在从事自己所擅长的“主业”的同时,纷纷以散文作“副业”,带着相当睿智的现实思考、丰富的生活情趣、深沉的人生感悟,以及精纯的语言特色的一大批散文,经常出现在省内以至国内的报纸副刊和刊物专栏,并且结集成专集和散文丛书。与此同时,文艺性的杂文的发展也很值得一提。以老作家王大海和刘思为代表的一批杂文作家的大量作品,以其内在的风骨和犀利的笔锋吸引了许多读者,与散文随笔一起,共同构成了一大文化景观。

当然,说到文学“豫军”,不能忽略它的从事理论批评的一翼。

长期以来,文学理论特别是批评,是河南文学事业中一个薄弱的方面。“批评缺席”的现象由来已久,专门的文学评论家和理论家很少。但是,新时期以来,这个状况有了很大改变。一批在大学、研究院、文联和新闻界工作的文艺批评家,如孙荪、叶鹏、刘思谦、鲁枢元、潘知常、陈继会、王鸿生、耿占春等,在当代文学的批评和理论研究领域,作出了和创作界的朋友相映生辉的贡献,和创作界形成互相切磋琢磨的健康友好的关系。公正地说,他们的工作对于河南文学创作的推动,是功不可没的。

还需要指出的是,在我省丰厚的传统文化积累的背景下,通俗文学的创作和整理改编,也很有成绩。民间故事、通俗故事、民歌、曲艺和通俗戏曲等,不仅产量很高,而且有不少佳作。80年代以来,通俗文学刊物的创办,带来了这类创作的新丰收。不少

作家由创作通俗文学开始,然后走上严肃文学(就和通俗文学相对意义而言)创作。一些专门从事通俗文学创作的作家在文坛崭露头角。

这样,新时期成长的一批作家批评家,和前面提到的那批中老年作家,以及在此后出现的更年轻的作家批评家,组成了以小说、诗歌、散文、文学理论与批评,以及戏剧文学、电影文学、通俗文学等门类齐全的文学“豫军”的基本队伍。

我这里只是顺手信笔点到,漏说了不少中年的老作者和更年轻的新锐的大名,我也没有顾及到孰先孰后的“座次”(我以为文坛基本上不存在这种座次,除非从文学史的角度寻找某种排列次序的需要),只是想由此即可看出一个重要的历史性的变化:文学“豫军”的阵容,确实已不可小看了。过去相当长时间,河南作家的名声和影响多是以个人的方式发生的,如姚雪垠、李準、张一弓等;新时期以来,文学“豫军”开始以整体的阵容发挥影响了。

五

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些人拿出了文学的真货色,甚至于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套路,成为文坛的“一个‘这个’”。

就文学样式的操作来说,这些作家中,作小说的多数都是从短篇开始,然后中篇,接着,都有长篇问世,有的还不止一部两部。尽管各人可能更长于短篇、中篇或者长篇,但基本上都是短、中、长“全能”的。而几位诗人则都是叙事诗、抒情诗,长诗、短诗兼擅。

同时,一种属于“豫军”的文学精神正在逐步培育出来。从表面看来,这是一支不打旗帜的文学劲旅,但却有其内在的精神风

骨。其文学精神基本特征是：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日渐宏大的文学气度，自觉的选择意识，以及追求艺术独创性的探索精神。总之，作家们在使自己的作品获得更丰富的生活容量、更深刻甚至某种超前的思想发现，以及艺术上的新鲜和熟练，而作出了巨大努力。

这种文学精神，表现在题材和主题的选择上，集中在这样三个焦点：

一是对深厚的乡土世界“情结”的依恋和析解。对于别的方面来说，这也许是个负担；但对文学来说，这是个宝贵源泉，尤其在现代意识和艺术精神的烛照下，这是现实主义精神的基本源泉。河南的作家十分看重这份得天独厚的财富。作为他们创作的中心和底色的是，对大地，对家族，对民族，对黄河，对自然，对苦难，对苦斗，亦即对本土历史文化与情感的记忆，审视，回味，探索，感悟，以及评判；这实际上是关于作家自己及其群体的“根”的自我寻找和挖掘。他们已经逐步把艺术的触角伸向了城镇和都市，如同他们中的多数已经大半生“侨居”于城市，或者已经是一个完全的城市人，他们已在城市与乡村的对比中来寻根与“刨”根究底了；但是，对于城市的把握究竟还是无法完全摆脱乡村的视角，站在现代人的立场来表现城市，还是一个需要下大功夫的新课题。

二是对当代生活的艺术发言。地处中国之中的河南不能不是一个当代生活中的富有影响力的活跃因素，它在这个正在变革时代的“进行曲”中，在它的“来龙”与“去脉”中，对它的意义往往是不能不予重视的。生活在这里的作家有着特殊的记忆和感悟。紧跟时代，是河南作家的传统。常常以此引起文坛关注并影响文坛的潮流，是其一大特色。他们的作品录下了永远鸣响在人们心中的英雄主义，它的明媚和灿烂，也留下了它的不肯也不会

自行消失的妖魔鬼怪，它在人的感觉记忆中留下的令人痛苦的巨大阴影。这是一个需要把照相机、录像机和 X 光、CT 透视一起对准当代生活才能认识的时代。在各种人的声音之外，作家的声音，文学的声音，尤其耐人回味。

至于对历史的思考 and 解读，我也把它归入作家对当代生活的艺术发言。因为如果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话，那么，一切关于历史的文学就更不能不是关于当代人的文学。关于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需要具有学者式的充分的历史知识，但是，从事这一题材领域创作的河南作家，却不是以书生气掉历史书袋，而是站在当代人的时代高度重新叙述历史。在把历史激活的时候，就把当代人的精、气、神给了历史；当历史被表现的时候，也就表现了活灵活现的当代人。

三是丰富无比的关于人的话题。文学是人学，这个曾经受到批评的话题现在已经成了大家的共识了。艺术精灵与思想结晶是“附”在人物的精灵之“体”上腾飞的。就单个人来讲，其欲望、情感、命运、性格，本身已经是难解的无限多样的方程式；而由人际关系组成的方程式就更是复杂得无法“计算”，而人类在整体上的普遍模式正是最有趣的代数学。就乡村人物来说，我们的文学家近一个世纪都在写，但是远远没有穷尽，因为人在变中。而对于城市的人们，文学家们还大多感到不好下笔。我们河南作家正在乡土世界和当代生活的基础上，以人为中心组成自己日益丰富的文学画廊，有越来越多的经由他们之手所创造的人物进入中国文学的人物序列。

六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文学“豫军”正在随着时代潮流的变化，

为更新更高的文学目标而默默地但是相当迅速地调整自己的视角和方式,以成为新的时代条件和文学背景下的一支劲旅。变化的端倪和初步的趋向已经显示了出来,这里只想指出主要的几个方面:

首先,是文学视界的拓展,力求使现实主义精神更加深化。文学不仅需要主要从政治视角出发反映现实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更注重反映民族和人类久远的普遍性的问题;由比较单纯的颂赞、暴露、批判,到着重于从对生活和生命的感悟出发进行的剖视、启悟和重建;由具象的微观的“小井”,走向抽象的宏观的“大千”。作家的政治情结、道德激情化为人文关怀。

第二,是在作为文学中心的人物表现上丰富程度的拓展及精神境界的深化。人物形象塑造上各种不必要的禁忌被打破以后,带来了人物形象的多样性,心理的丰富性,和独立活动于复杂世界的立体感。

第三,是在结构和叙事方式上,以行为逻辑与心理逻辑的交错所带来的现代特征的加强。在人或人群“混迹”世界的行为经历基础上,着重于个人对外部冲突的心理折射图象,和自我冲突的心路历程的表现,使得一种平面的线性的因果链正在被立体的多头的交错所代替。这个变化,不仅是内容的丰富,也带来了形式的新格局。

第四,是在语言特别是叙述语言上诗性特征和哲学意蕴的强化。由说(再现)出一个清楚明白的、曲折动人的故事,到倾诉并且评说,创造出一个经过拆卸又重新组装了的创造出来的生活、生命境遇。由恪守依照生活的本来样子进行写实,到在生活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想象力,构筑富有隐寓意味甚至寓言性质的世界。与此相适应,新的体验、感悟正在找到由东西方新的学科知识濡染下出落出来的中青年作家的新的语言方式。

这个过渡和变化,看起来似乎是静悄悄的,但确是内在的,实质性的。唯其如此,才是可贵的。唯其如此,也就不能不是激烈的,艰难的。

这是生活积累的较量,是思想能力的考验,更是文化的艰难磨练。

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追求,不是单凭个人的愿望,更不是喊喊口号就可实现的。它与忽视、轻视对生活和人生的深刻体验,与忽视、轻视以至缺乏系统的现代人文训练和濡染,必然产生深刻的矛盾;不成熟的条件却想“先锋”,必然在创作实践中产生夹生、驳杂、举轻若重的痛苦状态。要从根本上完成现代意义上的转变,需要在更高的层面和更深的层次上全面“武装”自己。

我们正处在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时代,与这个时代特点相适应的文化战略也应当是改革的和开放的。要使我们的文学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文学必须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冲出封闭和狭隘,走向现代和丰富;同时,文学又要在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以至独立的民族气节上有新的创造。这就必然要求作家更加深入生活,和生活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并且加强文学理论建设,使创作和理论批评有更加密切的关系,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局面。

我们的任务是繁重的,我们的前景是美好的。

好在这些已被许多作家所共识,好在文学“豫军”的中坚力量大都年富力强,尽管我们现在就说文学“豫军”已经八面威风还时尚早,上面所说到的诸端尚未充分展开,作为一支文学劲旅代表的大匠巨匠还正在锻造和攀登,但是,一个可以预见的美好前景在等着我们。在跨世纪的新背景下,文学“豫军”将在更加自觉的基础上,把文学事业推向新的层次,获得更大的发展与繁荣。

这项文化工程的完成, 赖于编纂委员会和德高望重的顾问以及分卷主编们的巨大的辛勤劳动。河南大学出版社, 作为一家以出版高校教材和学术著作为主的大学出版社, 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克服困难, 鼎力玉成本丛书的出版, 历史将证明他们的远见卓识。在这里, 我谨以本丛书编纂委员会的名义, 向他们表示真诚的感谢, 祝愿他们进一步坚定方向, 继续努力, 多出精品, 为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出版事业不断取得新的成绩!

1996 年 10 月

导 言

曹增渝

现代意义上的短篇小说的兴盛,在欧洲,是因经济的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而促成的;在中国,这种短小精悍的文体则一开始就连结着一部中华民族的血泪史、抗争史,并因其广泛的影响而成为 20 世纪中国文学中最重要的体裁。以鲁迅的《狂人日记》等作品为代表的一大批短篇小说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支生力军在现代文坛上曾经刮起一场革命的暴风雨,为中国人民的历史性觉醒,也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划出了一个新的时代,注入了充盈的活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五四以来七十多年的历史中,短篇小说始终是文坛上最为活跃的生力军。它敏锐地感应着时代的脉搏、世纪的风云,因而赢得了最广大的读者。与此同时,它在艺术上也日臻成熟,为后世贡献出一大批琳琅满目的精粹之作,以其久远的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在整个新文学事业中独树一帜。

其中,河南的短篇小说创作作为一个重要的集团军,其成就自然是不容忽视的。

—

河南省近七十年来的短篇小说创作,可以新中国的建立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划分为三个阶段。这两个界标,都不是单纯的政治事件,而是社会生活中一种历史性转折的开始,因而也就不能不对文化建设和文学创作发生深刻的影响。

在新中国建立以前,河南作为一个内陆省份,堪称穷乡僻壤,它既不像北京那样长期作为文化中心,集中了众多的文化精英,因而领导着近代以来的大多数文化潮流和文学时尚;也不像上海地处沿海,经济繁华,在中西文化的交会碰撞中,常得风气之先,有资格同北京分庭抗礼;相反,河南在近现代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远离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谓“天高皇帝远”,加以天灾频仍,连年战乱,兵匪横行,民不聊生,文化教育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有抱负有才华的文学青年,或者在苦难的生活中颠沛流离,或者负笈远游,到京沪等大城市寻求发展。正因为如此,河南省的小说作者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形成具有地方色彩的流派和团体,而是单兵作战,独立奋斗,分别凭借自己的文学才华和生活积累在文坛上立足。徐玉诺、冯沅君、师陀、姚雪垠、丰村等便是这一批人的代表。他们在20—40年代的短篇小说创作,体现着河南省的文学在新中国建立前的最高成就。

徐玉诺是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反映河南农村近代以来兵匪交加的苦难生活的第一人。他生于河南鲁山县的一个贫苦农家,中师毕业以后就不得不为养家活口而南北奔走。到处流浪的生涯,使他得以感受变革中的时代氛围,进而怀着深切的悲愤,用朴素而饱含情感的文字叙说着他对充满苦难的乡土生活的回忆。虽然如茅盾所说,由于“诗人气分很浓厚”,“他提起写小说的笔时,只是将他所有的印象单纯地再现,没有经过组织分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创作经验的日益丰富,他的回忆毕竟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富于立体感,在苦难生活的背景上,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